

记录中国“菜篮子”的时代变奏

在寿光 看云起

记者 李康宁

青史为镜,映照岁月峥嵘;墨迹成章,记录誓言无声。近日,一部饱含家国情怀,讴歌奋斗精神的长篇报告文学《看云起——中国“菜篮子”的共富样本》,引发业界关注。这部作品由寿光作协主席李桂华根据多年来亲身经历的采访和观察写就,全景展现了寿光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在作者的笔下,通过对寿光这个中国“菜篮子”的样本解析,一部中国农民的奋斗史、中国乡村的改革发展史徐徐展开。

7月8日,《看云起——中国“菜篮子”的共富样本》作品研讨会在济南举行。来自中国作协、山东作协、高校的专业作家及评论家汇聚一堂,对这本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与会专家认为,作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人文素养,践行“到人民中去”的优良传统,深入田间地头,躬身火热生活,用一手采访素材和扎实写作功夫,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从“区域致富”到“致富全国”的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推进之时,更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和样本意义。这本书,是一部写给时代、写给农民的诚意之作,是一部沾着泥土、带着露珠的匠心之作,是“一部关于中国乡村的山河册页、大地之书和乡土列传”。

寿光,是“文圣”仓颉、“盐圣”夙沙氏、“农圣”贾思勰的故里。其中“农圣”贾思勰在1400多年前所写的世界农学巨著《齐民要术》,为寿光留下了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基因,留下了“食为政首,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农业思想。然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寿光却常常笼罩在一种饥谨贫困引发的不安中,人口持续外流。

“饥饿就像迎面而来的夜色,塞满了他瘦小的身体。”在本书的开头,李桂华描摹了16岁的王伯祥推着木架子车,赶路几十里收割黄须莱果腹的情景。困顿未能消磨掉大家的意志,反而激起了求变图强的内生动力。寿光农民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契机,敢为人先抢抓机遇,通过对土地、良种以及种植技术的不断优化,重新激发了农业各生产要素的“活性”,实现了蔬菜种植业的颠覆性革命。

同时,他们开拓市场、打造品牌、振兴教育,锻造出寿光特有的工农互哺特色、城乡一体经验、乡村治理样板、全国致富思维等一系列实践真知,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寿光模式”。李桂华这本书的价值,就是集中展示“寿光模式”的精神内核和经典要义,为全国更多县域乡村提供借鉴。这本书,也为读者绘就了王伯祥、王乐义等一批改革先锋者的鲜活形象。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作家梁鸿鹰认为,《看云起》为我们建构起了一种寿光与中国农业文明史之间的深刻关系。作品以历史和文化为底色,从寿光蔬菜的前世今生,从王伯祥瞄准寿光传统寻找突围之路着笔,描写寿光走上绿色赢天下的发展历程。从书中读出了寿光人的坚韧执着,也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同样写过十八洞村脱贫攻坚的故事,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著名作家彭学明谈起题材相近的《看云起》时,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清新、清爽、清朗的作品,读后有清风扑面的感觉。“作品深刻表达了一群寿光农民的命脉,是怎样融入国家、民族的命脉



的,我也看到了这一块寿光土地的气息,是怎么样接通人类命运的气息的。从作品中看到了农民对土地的情义,看到了干部对百姓的情义,看到了绿叶对根的情义。”同时,彭学明也指出了作品一些有待提升之处,比如在艺术表达技巧方面,以及在细节力度和场景映照、人物刻画等方面,还要继续下功夫。

山东省作协主席,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发有认为,作家向记忆中的乡村深情回望,写出了寿光乡村振兴的辉煌历程。同时作者在作品中没有一味抒情,而是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前瞻性分析,让读者看清了寿光的来路和前程。“以《看云起》作为一个引子,我也向山东的基层作者致敬,李桂华通过自己的创作经历,树立了一个基层作者的创作样板。”

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丛新强表示,在阅读过程中感到这部作品具有明显的周立波作品《山乡巨变》的味道,可以说是一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史”。从寿光蔬菜产业切入,折射的却是寿光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一个缩影。总体来说,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相关问题,同步提炼出“寿光模式”的重要命题,具有超越性意义和普遍性价值。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守森,报告文学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徐锦庚等专家,对于书中的很多细节描写深有感触。比如寿光人突破“小农意识”,全国推介大棚种植技术的担当;比如王伯祥重奖功臣韩永山,展现人才重要性的果断。正是这些涓涓细流,一点一滴地构成了“寿光精神”。

作者李桂华介绍,本书是她书写的关于家乡寿光的第二部长篇报告文学。2018年,李桂华创作的关于国产蔬菜种子研发的长篇报告文学《种·梦》,曾获第五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看云起——中国“菜篮子”的共富样本》也入选山东省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并于2022年8月入选山东省“十四五”重点文艺创作项目。

“绿色是希望,是和谐,正如这片土地的精神特质。这些精神符号,就像路标,吸引着我,也指引着我不知疲倦地行走,充满喜乐的追寻。”她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家乡发展变化,深挖这块热土的鲜活素材。通过文学之力,让更多更好的寿光故事走进时代视野。



□孙南邨

晚清时期,“四大名臣”之首的曾国藩于同治年间四次到过山东,其中一次为“查阅”而来,三次是路过,其《日记》皆有记载。路经山东,匆匆而过,不必细说,倒是他在山东四个多月的“查阅”之行,有些事情值得一提。

同治五年二月初九,曾国藩为督师剿捻,于江苏徐州起程“赴山东济(宁)、兖(州)等处查阅”,十一日进入山东境内峰县韩庄,“又行三十五里至沙沟驿住宿,山东兖州镇、道、府、县俱来迎接”,“沙沟”是地名,为滕县(今滕州)辖。此时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协力大学士的身份督师剿捻,名高权重,所到之处,地方文武官员都有敬畏之心。

或许“查阅”之事不是那么紧急,曾国藩在这条驿道上走得非常缓慢。十二日由沙沟起程,“行二十五里至西仓桥住宿,因前途无可住之处,故少行也”;十三日“行五十里至南沙河打尖。尖后,又行十八里至滕县住宿,在道一书院作公馆”;十四日“行二十里在北沙河打茶尖。又行二十里至界河住宿。”仅在滕县一地,一百三十多里的路程就住了三宿。曾国藩以勤政律己著名,途中见客、阅文、批文,不曾有一日清闲。

十五日,曾国藩来到邹县(今邹城市),谒孟子庙。翌日,于途中绕道至凫村谒孟子父母之墓,并“策马登凫山顶一望”;然后来到曲阜,谒圣庙、崇圣祠、启圣祠、颜子复圣庙。十七日,谒周公庙、少昊陵、启圣王林。曾国藩在曲阜期间,凡胜迹、名物无不观瞻。

十八日至兖州,次日早饭后曾国藩“自兖州起行。登西门城楼,一为眺望”,行六十里到达济宁后长住下来。

五月中旬,曾国藩在六位幕友的陪同下“登礼泰山”。到达泰安这天曾国藩浏览了岱庙,住宿在泰安府考棚。翌日黎明早饭后登岱,曾国藩在泰山上对各处名胜都看得很仔细,记《日记》近1500字,且详略自如,可见其文字功夫,如关于经石峪的内容:“峪在大路过溪之东,约步行小半里。其上为摩天岭,岭上泉流涧中,巨石铺于涧底,纵横五亩许,刻《金刚经》其上,字大径尺四寸许,中署三大字,曰暴经石。又有明汪玉者著论谈文,其子汪坦刻之石上,侧署二大字曰经正。旁一巨石曰试剑石。”

在岱顶住了一宿后,曾国藩看到了日出,因此大喜过望:“因昨夕阴云微雨,计五鼓断不能观览日出,遂高卧不起,而幕友黎纯斋及薛叔芸、王鼎丞、叶亭甥四人登玉皇顶东轩。五更,严风微雨过后,竟得一睹日出之胜。乃知天下事未阅历者不可以臆测,稍艰难者不可以中阻也。”

这次登岱,曾国藩的《日记》记述颇

【史海钩沉】

曾国藩在山东的四个月

详,而且对游览作了小结:“此次登岱所欣赏者,在庙则为镇圭,为李斯碑,为汉柏、唐槐,为龙爪柏,为扶桑石;在山则为玉皇顶、无字碑,为《纪泰山铭》,为南天门。外此虽有胜迹,非所钦已。”

曾国藩还到嘉祥县谒曾子林庙。当他在宗圣庙看到“庙中规模偏小,朽败已甚”“养志楼,尤朽敝不能庇风雨”的情景时,就有“嘉祥圣裔式微”之叹,于是“捐祭产银千两,又赠广莆银四十两”。

曾国藩以好读书、学以致用著名,这一点在山东的四个月中也得到证实。在山东这段时间里,他主要看了《文献通考》的《兵考》《职官考》《选举考》《学校考》,再就是有人请为重刻王而农(王夫之,字而农)《礼记章句》作序,他“拟细看一遍,以便作序,因以考校对者之有无错误”。除了每天必读的书,曾国藩还为调节精神翻阅了《宗涤楼诗集》《方正学集》《宗涤南文集》《韵鹤轩笔谈》《渔隐丛话》《亭林文集》《池北偶谈》《群经平议》《清修宝鉴》《戴东原文集》等书。从此可以看出,他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书人、读书人、治学者。于邹县晚间、第二日途中,曾国藩看了《曲阜县志》;前往泰山舆中看了《泰安府志》,自然是为到曲阜谒孔、登泰山做准备。

曾国藩在山东所写《日记》中,与军事有关的内容并不多,但如果细看就会发现,他无时不在关心此事。比如,四月初八,曾国藩同阎中丞乘船阅视黄河、运河,途中谒分水龙王庙之时,他“登庙后高坡一望”发现了问题:“乃知南旺湖现已涸成平陆,车马可行。向来恃有一湖,此段全不设守,今乃知其疏矣。与阎中丞徘徊久之。”当天气酷热之时,他的《日记》中有“余在大屋高棚之中,尚可自适,军中则蒸灼难堪矣”的感慨,可见未忘官兵的冷暖。

在山东的四个月,曾国藩对农事也非常关心,他的日记有多处和农事有关的记录。比如,四月三十“至庙外观新麦登场”,五月初一“竟夕大雨,心以麦收未毕为忧”,初四“至庙外场上观打麦”,二十四日“是夕竟夜雷雨,倾盆不息,涤除郁炎,亦恰慰农家之望也”,六月十三“雨如倾盆,冷如深秋,北之梁菽,南之稻田,俱恐伤稼,深为焦虑”。

曾国藩在运河途中,时刻注意观察运河两岸的情景,比如,六月初七前往嘉祥,“沿途见运河堤墙概行坍塌,忧虑之至,因思一律改为板筑,与程牧绳武商议良久”;六月二十三于运河乘船离开山东那天,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沿途察看堤墙,自韩庄以下东岸皆系砂砾,土质绝少,修筑难于坚实,且水涨文余,与平日情形迥异。所修之墙,坍塌大半,且无子墙可以立足,殊不可靠。”

曾国藩在山东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留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足迹,至今仍被人们寻访、评说。